

亚当·斯密 与現代政治经济学

(苏)查果洛夫 著 晏志杰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亚 当 · 斯 密
与
现 代 政 治 经 济 学

〔苏〕 查果洛夫 著
晏智杰 译

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亚 当·斯 密
和
现 代 政 治 经 济 学

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大学校内)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武 汉 地 院 北 京 研 究 生 部 印 刷 厂 印 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25印张 109千字

1982年2月第一版 1982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统一书号：4209·4

定价：0.50元

译 序

为纪念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杰出代表亚当·斯密的主要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问世二百周年，苏联学术界曾于1976年6月在莫斯科大学举行了大型的科学讨论会，参加讨论会的还有东欧一些国家的学者。这本关于亚·斯密的专题学术著作，是由参加这次讨论会的一部分学者集体撰写的。

本书从时代背景、方法论和经济理论等方面论述了亚·斯密的《国富论》；集中地介绍和研究了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对亚·斯密理论体系的评价；评述了西方经济学界对亚·斯密学说的看法。此外，本书还介绍了苏联等国研究亚·斯密的历史和现状。可以说，本书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苏联经济学界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水平和特点。现将本书翻译出版，希望能有助于增进读者对亚·斯密这本著作的了解，以及对苏联经济学界在《国富论》研究方面的成果和特点的了解。这对我们进一步开展经济学说史的研究工作，特别是对亚·斯密及其著作的研究工作，或许是有益的。

本书可供科学工作者、教师、研究生和大学生参考。

在本书翻译过程中，曾得到陈岱孙老师的指导和帮助，他在百忙之中通读了译文，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唐璞先生仔细审阅了全文，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我对此表示深切感谢。

译文不妥之处，请读者指正。

晏智杰

1981.4.5.

目 录

亚·斯密《国富论》是第一个政治经济学体系·····	1
第一章 《国富论》：历史作用 ·····	17
第一节 亚·斯密及其时代·····	17
第二节 亚·斯密是封建主义和重商主义的 批判家·····	26
第二章 马列主义创始人论亚·斯密 对发展科学政治经济学的贡献 ·····	35
第一节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亚·斯密《国富论》 意义的评价·····	35
第二节 列宁论亚·斯密在经济思想史 中的作用·····	41
第三章 亚·斯密经济学说的方法论问题 ·····	49
第一节 亚·斯密经济学说的科学起点·····	49
第二节 《国富论》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职能 与规范职能·····	61
第三节 亚·斯密对经济规律的解释·····	69
第四章 亚·斯密对科学政治经济学某些范畴 研究的贡献 ·····	77
第一节 亚·斯密的生产劳动学说和马克思的 评价·····	77
第二节 亚·斯密《国富论》中的资本 积累问题·····	89
第三节 亚·斯密关于国际分工的思想	

与现时代·····	93
第四节 亚·斯密经济理论中的货币·····	100
第五节 资本主义信贷及其发展在亚·斯密著作 中的反映·····	106
第六节 《国富论》中的地租理论·····	113
第五章 亚·斯密和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116
第一节 《国富论》和现代资产阶级政治 经济学·····	116
第二节 资产阶级歪曲亚·斯密经济学说的 贗制品·····	127
第三节 论亚·斯密科学著作在现代资产阶级 经济思想史著作中的庸俗化·····	134
第四节 资产阶级经济学史家对亚·斯密 著作的态度·····	138
第六章 亚·斯密著作在苏联等国的出版与研究·····	144
第一节 亚·斯密著作在革命前的俄国及 苏维埃时代的出版·····	144
第二节 保加利亚、民主德国、波兰对亚·斯密 理论遗产的研究·····	152

亚·斯密《国富论》 是第一个政治经济学体系

H·A· 查果洛夫教授

时间是对精神创造的作品最可靠的检验。亚·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问世已二百年了。围绕这一著作基本思想的所有文献，都显示了时间对它的检验。

《国富论》的历史作用不能片面地估价。它的历史作用首先取决于，这部著作同政治经济学以往的发展阶段相比较，提供了什么新东西，对某些老问题有什么新解释，又提出了哪些新问题。它的历史作用还取决于，后来有哪些经济思想流派把它作为出发的基地，以及《国富论》所研究的全部问题在今天有多大意义。这部著作是对当时那个时代的概括。亚·斯密在这本著作中进行了创造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首次尝试，并规定了这门科学的“范围”。马克思指出：“在亚·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①

亚·斯密继承了前辈的优秀传统，把政治经济学规律解释成“自然的”规律，即客观的、不依人和政府的意志与愿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第181页。

望为转移的规律。然而，斯密所说的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在斯密看来，这些规律是自然的、符合于人类本性的。

列宁在反对司徒卢威的斗争中曾强调指出“自然”规律思想的巨大的积极意义。司徒卢威诋毁这一思想，并断言它已经“彻底破产了”。列宁在《又一次消灭社会主义》一文中指出：“说政治经济学中的自然规律的观念已经遭到破产……这与事实完全不符。”列宁又说：“古典作家摸索了，而且也摸索到了资本主义的许多‘自然规律’，不过，他们不了解资本主义的暂时性，也看不到其中的阶级斗争。……”

“但是，关于自然规律的观念，在社会的职能和发展中，却不是趋向没落，而是日益巩固。”^①

“自然”规律思想对政治经济学中的唯心主义是个严重的打击。在各个不同时期，都曾有人企图以唯心主义精神解释斯密学说的某些方面，把他当成唯心主义流派的鼻祖，但这种说法毕竟没有任何科学的根据。因此，相当一部分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史家，在思想上同政治经济学中的主观心理学派息息相通，他们对斯密及其《国富论》是不太尊重的。

亚·斯密表面上没有把政治经济学同经济政策理论区别开来。他在《国富论》中把重商主义（“商业或重商的体系”）和重农主义（“经济学家”学派，斯密把它看作“农业体系”在当时的变种）观点的全部总和称为政治经济学体系。^②此外，在第四篇《论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序论中，斯密说，政治经济学的任务也就是政治家和立法家的任务。^③

① 《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第190页。

② 参阅亚·斯密：《国富论》下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245页。

③ 参阅同上书，第1页。

斯密对各种“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划分，是根据它们各自的经济政策同经济的自然规律相符合的程度。由于十分注意经济政策，亚·斯密的《国富论》以政治经济学规律为开端，并且从是否符合“自然”规律的角度评价了各种经济政策。

可见，在分析的进程中，斯密实际上把来自人类自然本性的客观政治经济学规律同经济政策的规范任务区分开了。尽管后者总是研究和揭示客观经济规律的动力，然而把两者混淆起来无论何时都不利于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这个原理，在《国富论》出版200年后的今天，在列宁的《又一次消灭社会主义》一文发表65年后的今天，仍有现实性。

实际上，斯密承认的只是那些为显现经济自然规律的作用创造条件的规范任务。因此，他对重商主义体系整个说来采取了一种批判态度，认为它“就其性质与实质说，就是一种限制与管理的学说”，它“不让各个人在平等自由与正义的公平计划下，按照各自的路线，追求各自的利益，却给某些产业部门以异常的特权，而给其它产业部门以异常的限制。”^①

亚·斯密批判地克服了“经济学家”们（重农主义者）认为只有农业劳动才是生产性劳动的局限性，同时，斯密也高度评价了并实际上完全赞同重农主义者诉诸自然的经济规律的思想。斯密是从下述思想出发的，即只有遵循这些自然规律才能保证真正增加财富。斯密在解释重农主义学说时指出：“这一学说把投在土地上的劳动，看做唯一的生产性劳动，这方面的见解，未免狭隘；但这一学说认为，国民财富非由不可消费的货币财富构成，而由社会劳动每年所再生产的可消费的货物构成，并认为，完全自由是使这种每年再生

^① 亚·斯密：《国富论》，下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229—230页。

产能以最大程度增进的唯一有效方法，这种说法无论从哪一点说，都是公正而又毫无偏见的。”^①

亚·斯密对商品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一理论对研究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一种形式）具有重大意义。他明确区分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他把使用价值理解为“特定物品的效用，”^②并指出，交换价值量同使用价值无关：“使用价值很大的东西，往往具有极小的交换价值，甚或没有；反之，交换价值很大的东西，往往具有极小的使用价值，甚或没有。”^③。劳动价值论的这些具有重大意义的基本原理，对于今天克服某些人还想从效用引出交换价值的错误观念，仍是很现实的。

亚·斯密把生产关系作为一切经济关系的基础，这在现在同样有现实意义，因为也还可以遇到那种认为生产关系只是对商品生产来说才存在的说法。

亚·斯密没有分析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没有从性质上对创造价值的劳动作出说明。不过，他实际上是从抽象掉了具体形式和数量（从上下文看，应为质量一译者）比较的劳动出发的。尽管对决定价值的劳动的解释有许多矛盾，然而，正是《国富论》，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第一次充分地研究了作为价值源泉的劳动。列宁据此写道：“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研究经济制度的时候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马克思继续了他们的事业。”^④。

依据劳动价值论，亚·斯密提出了利润来自工人劳动的

① 亚·斯密：《国富论》，下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244—245页。

② 同上书，上卷，第25页。

③ 亚·斯密：《国富论》，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25页。

④ 《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第5页。

原理。在分析雇佣工人生产的产品价值的各部分时，他指出，“劳动者对原材料增加的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就分为两个部分，其中一部分支付劳动者的工资，另一部分支付雇主的利润”。^①尽管在把利润解释为价值的组成部分的同时，在斯密那里又遇到了另一种解释，即同预期的各种收入一起又成了价值的源泉，但是，他提出的利润源泉的原理至今在同辩护性利润论的斗争中仍有现实意义。好象预料到资本主义的辩护士们会把利润看作工资似的，斯密指出，“也许有人说，资本的利润只是特种劳动工资的别名，换言之，不外是监督指挥这种劳动的工资。但利润与工资截然不同，它们受着两个完全不同的原则的支配，而且资本的利润同所谓监督指挥这种劳动的数量、强度与技巧不成比例。”^②可见，斯密已十分接近于创立剩余价值理论了。

斯密没能发展这一理论，然而他为理解资产阶级社会收入的源泉已经提供了许多东西。他的《国富论》乃是系统地说明资产阶级社会阶级划分的经济基础、研究各阶级收入及其流向的尝试。马克思和列宁都曾指出过这一点。^③单单这些成就足以使《国富论》成为政治经济学史上的一个巨大的科学里程碑。

还应当指出对理解这一著作的历史作用有巨大意义的若干情况。

亚·斯密是中世纪经院学派、封建主义经济关系体系以及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的批判者。为自由放任原则即完全自由

① 亚·斯密：《国富论》，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43页。

② 同上书，同页。

③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第164页。《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第193页。

竞争而斗争，在他那个时期具有进步的性质。列宁说，斯密是“先进资产阶级的伟大思想家。”^①他的经济政策和反封建的要求，在《国富论》中得到了充分的政治与经济论证。

列宁说斯密是“先进资产阶级的伟大思想家”，这是指下述事实，即18世纪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尚未妨碍他们公正无私地研究客观经济规律。而《国富论》正是这种研究的成果。它反映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所能做到的对经济制度科学认识的成果。代表社会进步利益的资产阶级，能够大胆地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关系，把它看成自然的、即符合人类本性的关系。这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还没有把掩盖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作为自己的任务。它尚未看到这一矛盾的发展的形式及其前景。

下一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必然要研究这些矛盾。李嘉图的著作就是最明显的例证。他进行了分析阶级矛盾的经济基础的尝试。尽管李嘉图未能指出资产阶级社会的主要矛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但是，把从经济上阐明各阶级利益的对立包括在政治经济学之中这一事实本身，无疑是重要的：政治经济学范畴开始被视为各阶级利益的对立性的表现。

《国富论》是创立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第一个成果，它提供了研究政治经济学范畴所组成的总体的范例。同时，这部著作又是把这一整体的各部分系统地组合起来的尝试。亚·斯密在价值理论上首先提出了（虽然未能解决）这一任务。

由于把资产阶级社会制度视为自然的制度，斯密看不出使这一制度产生和灭亡的经济发展所必然经过的形式。而历

^① 《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第445页。

史表明，资本主义以前存在过另一种商品生产形式。斯密称之为“原始社会”。他记录了这一事实，却不能从历史上和逻辑上说明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的过渡。

这一任务在理论上多么复杂，从下述事实即可看出：亚·斯密的直接继承者、伟大的李嘉图，因为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在实际上企图取消它，甚至用资本主义生产的范畴去分析最初的商品生产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科学地解答了简单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关系问题，指出无论在历史上或逻辑上（即理论上），简单商品生产都比资本主义生产占先。然而，在现代，这一科学答案实际上未受重视，在某些时候，甚至还被《资本论》的个别注释者所否认。因此，斯密提出的简单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关系问题，不仅有巨大的理论意义，而且有方法论的意义。这是他的伟大功绩之一。

既然斯密未能确切指出各范畴之间历史的和逻辑的联系，所以，他就把反映现象之本质的不同程度的范畴放在一个平面上进行研究，对处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不同程度的范畴不加区分。马克思把《国富论》的这一特点看作是把两条研究路线结合到同一原理上：内在的路线，即在现象的内在联系上研究经济关系；外在的路线，则是在表面上所呈现的形式上研究它们。^①这便导致了斯密对同一范畴的互相矛盾的解释。

斯密主要著作中的外在路线，就它本身而论，是科学认识的必经阶段。正如马克思所说，只是把它看得同内在方法一样重要，甚或以它代替后者，才是不科学的。还有必要强

^①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第181—182页。

调指出,马克思把研究方法划分为内在的与外在的,对在下述问题上提高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水平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这些问题是由于资本主义向垄断阶段过渡以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出现的。用外在方法代替内在方法,特别明显地表现在“资本主义变质论”,“有计划的资本主义”这些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概念中。对那些把攫取垄断超额利润的“有计划按比例”的形式同有计划按比例地组织社会生产混淆起来的辩护论来说,上述的代替成了方法论的前提。

同时,还不能不看到斯密的外在方法同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代表者的外在方法的深刻区别。在斯密那里,外在方法并不排斥内在方法,两者实际上是并存的。而在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里,外在方法代替了内在方法。他们在亚·斯密的理论遗产中只找出那些外在的因素,并从中建立起庸俗的体系。他们津津乐道斯密那些个别的庸俗的实质上不是他的整个体系特点的见解;他们拒绝客观经济规律的思想,把揭示客观经济规律的任务混同于经济科学的规范任务;最后,使政治经济学的体系不复存在。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台柱之一萨缪尔森就是这样干的。

内在与外在两种路线的并存,既表现出斯密对科学的公正无私,又说明了他在创立政治经济学体系上并未完成,而在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范围内也是不可能完成的。李嘉图的体系说明了这一点。他把各种范畴都归结到一个统一的基础,却否认商品生产形式的发展,否认他所说的范畴必然的形态变化。

马克思对斯密体系中两条平行路线的评论,不仅在同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斗争中有现实意义,而且在批判地对

待不久前出现的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不成功的尝试上，也有现实意义。由于想论证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应该包括所有实际存在的社会生产关系，想指出这一体系的运动是相互作用的各范畴体系的运动，有时就以单一的方法不正确地解决这一问题，结果把内在范畴与外在范畴混淆起来，事实上取消了体系的阶梯。

当科学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被新的范畴丰富起来时，总是需要学会把内在序列的范畴同外在序列的范畴区别开来，并找出它们之间的必然联系。在这个意义上，《国富论》体系的缺点，不仅应被视为首次尝试创立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幼稚”，而且应被视为科学在向上发展中的每一阶段的艰难。认为社会主义的全部范畴的价值与意义都是相同的人，借口理论接近实际，却忽视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阶梯性原理。这无助于它的发展。

不深刻地研究经济发展的经验，就不能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因此，必须反对以空泛的议论代替对实际过程的概括。然而也不应忘记繁琐哲学和经验主义的危险。亚·斯密“没有清楚地用一个不同于剩余价值特殊形式的特定范畴来阐明剩余价值”，而把它混同于利润。马克思在评论这一点时指出，“粗俗的经验主义变成了虚伪的形而上学，变成了繁琐哲学，它绞尽脑汁，想用简单的形式抽象，直接从一般规律中得出不可否认的经验现象，或者巧妙地使经验现象去迁就一般规律。”^①应当始终牢记：没有比好的理论更实际的东西。

《国富论》是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阶段先进的资产阶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第69页。

所创作的科学文献。因此，它对于“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这一研究任务的回答，不能不带有自己时代的印记以及《国富论》作者客观上所代表的那个阶级利益的印记。斯密对国民财富问题的研究，是从生产的单个当事人的利己主义同全社会利益可以协调这一点出发的。

不过，在现代条件下，当社会生产效果问题提上日程时，斯密解释国民财富问题的某些方法还是值得注意的。

在斯密看来，财富的源泉是劳动。与他的前辈——认为只有农业劳动是财富增加的源泉的重农主义——不同，斯密克服了使财富得以增加的劳动这一概念中的具体部门的局限。同时，他没有忽视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别。在方法论上重要的是，斯密提出了总的社会劳动划分为生产的与非生产的比例问题，以及把它作为“国民财富”的要素即社会生产效果的要素问题。

这里不去分析和评价斯密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解释，重要的是强调指出，关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问题的提法，不仅在现代仍有意义，而且变得更加重要了。现在，同非生产领域的扩大有关的一种想法在不断出现，即企图抹煞社会劳动中的生产领域与非生产领域的区别。斯密解释生产劳动问题的某些方面，是反对上述观点的理论上的一种屏障。最后，斯密提出只有同资本而不是同收入相交换的劳动才是生产性劳动的问题，就是把生产劳动问题的社会经济方面提到了前列。这一点，在政治经济学体系中，在从抽象逻辑地上升到具体的过程中考察它时是很重要的。

斯密关于劳动生产率要素的提法在今天仍是有意义的。他从两方面提出这一问题。第一，他研究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技术经济因素。他的学说表达了时代的特点。他说，“有用

劳动的生产力的改进，取决于：（一）劳动者能力的改进；（二）他工作所用的机械的改进。”^①分工——这是提高生产力的主要源泉。劳动生产率的物质要素，首先是劳动工具及其改进是生产力增长源泉的问题，斯密并未忘记，不过被放在第二位。

斯密没有局限于技术——经济要素，他还仔细研究了财富增长的社会经济要素。在现代条件下，当提高社会生产效果的任务越来越迫切，当深入研究经营效果的社会经济标准问题成为动员提高生产效率的所有要素，而不仅仅是技术——经济要素的必要条件时，有必要强调这个方面。

亚·斯密认为，提高生产效率的主要社会经济要素，就是创造自由竞争的条件。他明确意识到资本主义生产各代理人之间利益的对立，看到了企业主（工业家和商人）竭力为自己创造有损于社会的垄断条件。他说：“不论在哪一种商业或制造业上，商人的利益往往和公众的利益不同，有时甚或相反。”^②他指出，企业主（商人和工业家）的特点是限制竞争。他反对限制竞争，反对垄断。

尽管现代垄断和斯密所批判的垄断毫无不同，然而他反对垄断的论据在今天还是有用的。但他提出的用以代替垄断的自由竞争，在现代看来好比经济政府主义。现代垄断在资本主义社会化过程中有其固有的基础，用以代替它的，不是自由竞争，而是以社会化的社会主义形式代替它的资本主义形式。

亚·斯密相信，创造自由竞争的条件，就是创造这样的条件：在这种条件下，对生产的单个代理人有利的事情，归

① 亚·斯密：《国富论》，下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243页。

② 亚·斯密：《国富论》，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242页。